

■ 走访中国四大藏书阁系列之二

文溯阁：溯洄求本 书藏九州

本报记者 赵征南



沈阳故宫博物院内的文溯阁，其冷色调和周边红墙黄瓦的暖色调形成鲜明对比。

(王爱华供图)

记者日前从沈阳故宫博物院获悉，饱经风霜的文溯阁，有望迎来新世纪的第一次系统修缮。

按照乾隆在《文溯阁记》中所说，文溯阁的“溯”是取“溯洄求本”之意，对应沈阳这片清朝“发祥之地”，以表达自己“不忘祖宗创业之艰，示子孙守文之模”的用心。

作为存贮《四库全书》的“七阁”之一，文溯阁坐落于半米高的高台之上，整个建筑平面为矩形，坐北朝南，面阔六间，进深九檩，建筑总长26.23米，总高15.683米，总宽16.10米，建筑面积720.7平方米。作为皇家藏书楼，文溯阁在建筑规制、建筑功能和理念上，既参照了天一阁的规制，又根据传统的做法和陪都宫殿建筑的特殊身份而多有发展和创新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艺术特色。



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书籍。



用满、汉双语写着“文溯阁”的门额。



文溯阁檐下彩画“白马献书”。



1971年-2006年文溯四库藏于兰州甘草店战备书库。



2005年，兰州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藏书楼竣工。(均资料照片)

万红之中一点绿

走进沈阳故宫，从西掖门向西，而后向北穿过戏台，便到了一面打开的三间悬山屋宇式宫门。在这里，不少游客都会发出惊叹：“怎么里面的房子是绿色的？”

宫门之内，便是大名鼎鼎的文溯阁。从外观上看，与其他宫殿建筑相比，文溯阁一个最明显的不同之处，就是殿顶不用琉璃瓦而是黑琉璃瓦镶绿边，廊柱用绿色而不是红色，檐下的彩画也不用龙凤等图案，而是“如意书卷”、“白马献书”等以书籍为主要表现内容，并且采用蓝绿为主的色调。

为何是黑、蓝、绿等冷色调，而非红、黄这类帝王之色？是不是由于藏书楼需要庄重、典雅的气韵氛围而做的选择呢？

“身在宫外，已闻书香，这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原因。不过，更主要的原因还是防止火灾。”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爱华说，“文溯阁与沈阳故宫其他建筑黄琉璃瓦铺心、绿琉璃瓦铺边、朱红门墙的暖色格调 and 喜庆氛围截然不同，整个建筑及装饰色彩以冷色为主调，这是遵循了我国古代在建筑装饰色彩的运用上以‘五行’定色的传统习惯，即水可制火。”

“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具有很大的火灾隐患，为此，文溯阁在建造时，采取了多种防火措施。包括阁前摆放水缸，以及不同于一般东北建筑的北侧窗通风等。但若火灾真的发生，救起来也非常麻烦。所以，古人也在设计建造中通过一些理念来表达‘祛火’的良苦用心。这些理念或许未必能起到实际的防火效果，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，反映了古人的智慧和期盼。”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声能说，“在文溯阁上，防火理念除了上面说到的冷色调，还包括取名‘溯’字有水，以及参考天一阁‘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’等。”

礼乐复合的院落式布局

实际上，“地六”与传统宫殿建筑“奇数开间”是有冲突的。“奇数开间有利于轴线布置。若是偶数开间，门放在哪里才能对称？皇帝的宝座还能放在西路建筑的中轴线上吗？”李声能说，“文溯阁进行了巧妙的处理。‘地六’的六间实为五间，五间正中一间最大化，突出主体，而最西侧加设明显的楼梯间。如此，既符合‘居中为尊’，也符合‘地六成之’，又解决了上下楼通行问题。”

巧妙的设计还包括“明二暗三”。文溯阁在“天层”和“地层”之间加造夹层，即外观看上去重檐两层，实际上却利用上层楼板之下的腰部空间，在五大间的北侧和东、西两间加构“凹”形“仙楼”。如此，既营造了一个宽敞的入口空间，又增加了摆放书架的面积，并与两层的外观相适应。

作为“北四阁”中最后一个建成（1783年）的藏书楼，文溯阁还有哪些鲜明特点呢？首先是门额的安放位置。文溯阁、文溯阁等门额悬挂在顶檐正中，一眼望见；而文溯阁则挂在下层檐下，如果从远处看文溯阁，根本看不到门额，只有走近方能察觉头顶有一蓝色底的门额，上面用满汉双语写着“文溯阁”。“过去，有观点认为，文溯阁门额挂错位置了。后来有专家表示，文溯阁门额硕大，与阁比例失调，也比沈阳故宫其他宫殿门额大出许多。这是由于文溯阁整体要小于北京文溯阁，而门额设计师来自北京，对此并不知晓，闭门造车，因此顶檐下无处悬挂。”李声能说，“我

不认为是挂错。挂在下层檐下，也无明显不适，或许最开始就有如此打算。毕竟，门额的设计和摆放，都要符合礼制，在验收上有严格规范，不会乱来。”

在李声能看来，文溯阁及周边建筑礼乐复合的空间布局，是乾隆对陪都宫殿使用功能要求的明确体现。由于乾隆文化艺术修养极深，因此他在对盛京宫殿西路建筑规划时特意补充了文化功能，戏台（文溯阁独有）、文溯阁和仰熙斋（配套书斋）依此相连，为帝王和臣子留有不同通道分别前往。而且，文溯阁是“北四阁”中唯一没有水、石、松相伴的一阁，采用和沈阳故宫整体风格相一致的院落式布局，而非园林式布局。这是因为盛京宫殿是太祖、太宗创建的宫殿，乾隆在新建建筑中很谨慎，注意与入关前建筑在风格上的协调。如此，既尊崇礼制，又注重陶冶情操的环境，可谓礼乐复合。

书阁之间的分分合合

文溯阁建成时间相对较晚，但《四库全书》入阁时间却排在第二位。

“乾隆对沈阳老家还是非常重视的。北京到沈阳700公里，他唯恐车载伤书，选择用人力抬运四库全书。这在当时的奏折中有明确的记载。比如多罗仪郡王永璇奏曰‘查此项书籍俱经裁切打磨出细，并装有鞞带，与现在恭送热河草订之本、可以用车装载者不同，必得按例抬运，方为慎重。’”王爱华说。

1783年，《四库全书》正式进入文溯阁。当时，阁内书架皆为专门制做，上面刻有“四库全书某部”“第某架”，按次序排列在各层。下层放《四库全书》经部二十架共九百六十函，另有同乾隆时修内府写本大型类书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十二架共五百七十六函；中层仙楼放《四库全书》史部三十三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；顶层放《四库全书》子部二十二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、集部二十八架共二千零一十六函。以上共《四库全书》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万六千多册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五百七十六函五千零二十册。此外，下层还有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目、考证、简目目录、分架图等辅助类书籍，以便于查找和阅读。

王爱华告诉记者，文溯阁内所藏《四库全书》不仅内容丰富，而且也是难得的文物和艺术珍品。抄书所用是洁白柔韧的特制开化榜纸，印有红色的框界和格线，墨书字体工整娟秀，一笔不苟。首末页盖有“文溯阁宝”“乾隆御览之宝”玺印。书册为仿古的软包背装，封面绢质，经部绿色、史部红色、子部青色、集部灰色，以便区别，每函外又盛以特制的楠木书匣，既考究又便于保管。

清代《四库全书》入藏文溯阁后的百余年间，由于清政府的重视，图书与建筑一直保存完好。但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，内忧外患，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虽保存基本完好，但也经历了许多磨难：1915年11月，民国政府将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运至北平古物陈列所，导致文溯阁与《四库全书》第一次书阁分离；1925年，奉天省政府在各方努力下，使得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复归奉天，在对文溯阁加以修缮后，复将《四库全书》入藏阁中，结束了十余年来“书阁分离”的历史；1935年，伪国立奉天图书馆认为文溯阁年久失修，渗漏现象严重，于文溯阁前西南处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二层“水泥库”，称为“新阁”，1937年6月“新阁”竣工后，文溯阁的《四库全书》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全部移入新阁，至此，《四库全书》再也没有回到文溯阁；1966年，中苏关系紧张，为确保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的安全，《四库全书》另行甘肅，

至今，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已离开辽宁50余年。

修缮计划今年正式实施

世事变幻，书去楼空。如今的文溯阁，清空落寞，只剩下苍凉的楼影。

目前，文溯阁仅仅开放一楼中央的厅堂，并只允许在大门口处参观，游客不得入内。向里望去，正厅中间端放着乾隆的书桌和龙椅，书桌上摆放着绿、红、蓝、灰四本仿真书籍。象征着文溯阁四库，厅的中央，高悬着“圣海沿回”的牌匾，其下有一幅楹联“古今并入含茹万象沧溟探大本，礼乐仰承基绪三江天汉导洪澜”，两者皆为乾隆亲题。厅左右两边的书架上摆满了黄色的楠木书盒，古朴肃穆。

“文溯阁内的陈设布局基本没有变。由于原书外迁，现有复原陈列的书架和桌椅是原物，图书则是复制的，而且仅仅复制了书匣，里面并无书籍。”李声能说。

而在文溯阁的东侧，建有一座红墙黄瓦的方形碑亭，内立满汉合璧文字石碑，正面刻《文溯阁记》，背面刻《宋孝宗论》，都是乾隆皇帝御撰文。

经历200多年风雨的文溯阁，如今的“健康状况”如何呢？“整体上看相对稳定，并无重大险情。由于文溯阁仍未通电，防火压力较小，未来的主要工作就是防渗漏。”李声能说，相应的修缮计划已经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，将于今年正式实施。

据他介绍，依据《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》，维修的原则是“现状修整”，即保证原来的建筑形制、结构、材料和工艺技术。旨在排除建筑隐患，恢复文物本体的健康状态。具体来说，根据文溯阁屋面实际勘察情况，屋面（屋顶的表面）漏雨是建筑破损的主要原因，故此进行维修工程，揭挑屋面至望板，修补糟朽的飞椽、方椽、连檐、瓦口板、望板，朽损严重不能再继续使用的要谨慎的态度予以更新；门、窗重新检修、加固；重新油漆外檐、下架木和门窗，归安台明、台阶条石。在室内装修方面，检修漏扇，添补缺损的枝条，重新打蜡；修复室内悬挂的匾、联；检修加固书架。

与此同时，碑亭屋面也将做类似的修缮。可惜的是，即便修缮工作全部完成，文溯阁彻底开放依旧几无可能。“因为文溯阁在设计时考虑只有帝王等少数人进入，上下楼的楼梯又陡又窄，导致楼梯等处不具备开放条件。根据文溯阁的最小干预原则，为了保存文溯阁的真实性，我们又不可能对文溯阁进行‘改建’。所以，想进入文溯阁爬楼梯远眺的人恐怕要失望了。”李声能说。

文溯四库身边的守书人

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工作近20年的李声能有一个梦想：有一天，远在兰州的《四库全书》翻越崇山峻岭，叶落归根，回到文溯阁，安享余生。

然而，实现“书阁合璧”的梦想却并不容易。一切，都要从文溯四库颠沛流离的历史说起。从《四库全书》进入文溯阁的那一刻起，就一直有守书人相伴。根据史料记载，1783年，朝廷增设文溯阁衙门管理文溯阁事务，设置俸催长一员、食宿催长一员，掌《四库全书》之藏。每年八月将文溯阁内书籍晾晒一次，每年四月由盛京工部领取潮脑66斤、野鸡毛掸10把、短把鸡毛掸8把，以供保管图书之用，并及时上报文溯阁衙门修葺事宜。

只有清代文溯阁才有守书人吗？50多年之后，再在沈阳寻找见过《四库全

书》的人实在太难，在辽宁省图书馆的帮助下，记者找到了辽图退休副馆长韩锡铎。他的答案是，“有”。原来，在《四库全书》迁兰前的几年里，有一位名叫夏钧德的沈阳老人，陪它走过沈阳的最后旅程。

韩锡铎回忆，1964年，身为北大中文系首届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生，他被分配到辽图工作。从当年9月起，几乎他每个星期都会去文溯阁边上的水泥库，对《四库全书》进行检查和编目。“从听说亲眼看见，摸着最上乘的开化纸，非常激动，生怕弄破了纸张，也不敢细看，翻几下就放回铁质书架。”他想起了第一次见到《四库全书》的情景。

在编目期间，他结识了附近居民夏钧德。夏钧德每天一起床就来到水泥库，开门通风，打扫卫生，禁止生人擅入。“他不是文化人，但却自觉坚持守护《四库全书》，这太不容易了。”韩锡铎说。

1965年，鉴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，辽宁省对古籍善本进行战备转移。韩锡铎告诉记者，最初《四库全书》准备转移到凌源县的万祥寺。然而，在装箱外运之前，辽图在清点检查时发现部分书中出现不同程度的黄斑，时任领导深感责任重大，申请将书调离辽宁，以期更好的保护。通过层层上报，文化部办公厅发文要求辽宁将书转至甘肃。”他说，“由于迁兰是在秘密条件下进行的，极少有人知晓，绝大部分沈阳人都来不及和它道别。”

1966年，社会已出现破坏古籍的现象，沈阳铁路局在高度保密下精心安排，10月7日，辽图2人和甘图5人随火车押运。一路上，火车多停在远离城市的小站，吃饭喝水供应困难，但押运人员坚持坐在闷罐车里，直到7天后火车抵达兰州。兰州军区27辆军用卡车和部队战士已提前1小时抵达，将书立即装运、运抵永登县连城鲁士司衙门。四年零八个月之后，《四库全书》被转移到干燥凉爽的甘草店战备书库。

上世纪70年代起，甘肃省《四库全书》研究会常务理事、研究员周永利在甘肃省图书馆工作期间，有幸结识了方学俊、刘德田和丁学义这三位甘肃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守书人。

“他们都是城市户口的‘乡下人’，没有休假的概念。尽管按照规定每个月有3天假期，但极有责任感的他们几乎全年待在书库，很少回城探亲，甚至很长的时间里，他们的妻子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工作。方学俊患上了严重的胃病，刘德田则是连续12年没有在家过一次春节。”周永利说，“守书生活非常枯燥。防火防盗是全天候的工作。库里一年四季都要防潮、防霉、防虫蛀，夏天必须经常开窗户通风，平常则要保持清洁，还要经常翻动检查书的变化。他们还苦中作乐，将房前屋后、山上山下挖掘平整成层层梯田，栽种果树、种植庄稼、蔬菜和花草，使原来的荒山荒坡变成了一座绿荫成行、鸟语花香、清静幽雅的‘花果山’。”

守书人的故事仍在继续。如今，第三代守书人丁学义从甘草店来到了九州台新藏书库，继续着守护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的使命。

《四库全书》影印“三缺一”

从上世纪末开始，关于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的归属争议逐渐多了起来。曾有来自辽宁的全国政协委员撰写提案呼吁，为了实现书阁合璧，保持文物的完整性，要求甘肃向辽宁归还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当时，韩锡铎也参与到文溯四库的回归协调中。他回忆，1987年，自己身为

辽宁省政协委员提出的第一份提案就是要求文溯四库回归辽宁。“我当时的想法是，无论文溯四库现在在哪里，仅仅从‘文溯阁’这个冠名上看，它就应该是辽宁和沈阳的旧物，理应回归。”他说。

但是，甘肃有关方面却不这样认为。2000年12月，甘肃省人大会议通过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文溯阁（四库全书）保护工作的若干规定》，确立了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在甘肃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。

2005年7月，位于兰州制高点——九州台的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藏书楼竣工，旨在《四库全书》的永久收藏和保护。

该馆投资5000万元，建筑面积5727平方米，继承四库七阁的传统风格，在结构、密闭性能、保温隔热性能、防水防潮性能、抗震性能等方面严格要求。特别是在安全防火方面，藏书地库配置了恒温恒湿机以保持湿度的均衡，安装全自动气体灭火系统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，重要部位还设置了安全防盗装置和电视监控系统。

就连当初要求甘肃归还的部分辽宁人士，都对甘肃在文溯四库上的保护予以肯定。韩锡铎在1998年和2004年的2次甘肅之行后就认为，“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得其所。如果文溯四库能回来最好。当然，必须看到如今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在甘肃超过半个世纪，甘肃也对《四库全书》的保护极为重视，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和大量的资金，尊重既成事实以及甘肃的保护成果，或许也是一个选择。”他说。

而李声能也提出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——搁置争议，共同利用。近年来，沈阳故宫开展“文物省亲”活动，即南迁文物探访曾经安家的沈阳。他希望，沈阳、兰州两地的文物守护者不要害怕“见面尴尬”，主动沟通，有朝一日组织一部分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回到老家短期“省亲”。

除了归属争议，在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的后续保护上，也存在一个较大的争议——是否需要数字化影印。

目前，文溯阁本、天津阁本、文溯阁本都已影印，现存《四库全书》正本中只有文溯阁还未影印。

“主要是观念的差异。不少人担心影印会造成原书的损毁，也有人忧虑甘肃经费不足，回报缓慢。但是，我认为，这都不是问题。如果不做影印，那么在外观载体和内容信息等传承保护的层面上，都有隐患。影印是更好的保护。”周永利说。

在他看来，即便兰州相对干燥的气候有利于保护古籍，且有恒温恒湿机的帮助，但这些因素只能有限地延续纸张的寿命，不能彻底改变纸张的自然轨迹。因此，必须未雨绸缪，提前为缺损做好影印准备。

周永利坦言，在内容信息的传承上，目前做得还是太少，“现在只有少数人能看到《四库全书》，大多数人都没见过真面目，自然对四库中的内容信息缺乏研究。而影印则可以加速相关研究。更主要的是，影印以及之后的公开是一种‘文化惠民’的措施。若是老百姓看都看不到，如何激起他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呢？”

对于投入和回报，周永利认为，之前的四库影印经验证明，投入可以通过吸纳民营资本解决，回报更是不成问题。“退一步说，即便金钱回报不够，那么仅仅是保护国宝、传承文化的美名，也足以吸引相关投入。”他说，“包括上海古籍出版社李祚唐在内的许多专家都来到兰州，支持影印的想法，应该结束四库影印‘三缺一’的状态。”

记者从甘肃有关方面了解到，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的影印工作尚未正式展开。